

# 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

——评《美国黑人运动的政治过程  
和发展(1930—1970)》

杨 灵

## 一、导 言

自社会运动作为社会学重要分支领域的地位奠定以来,研究者就一直在思考以下关于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核心问题:在哪些因素的作用下,心理失衡的个体会大规模走上街头,或是揭竿而起?掌握资源的精英在动员被剥夺群体参与抗争时扮演了何种角色?哪些组织在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中会起到作用,而这些作用又如何随着组织形式的变迁而变化?如果把问题进一步推展开,我们又应该怎样解读社会运动与其置身其中的制度政治(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s)之间的关系?

在《美国黑人运动的政治过程和发展(1930—1970)》(*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一书中,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运用政治过程(political process)理论,展示了上个世纪30至7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发展和衰退的内在逻辑,也回答了上述社会运动研究中不可绕过的理论问题。本书详实细致的经验研究已成为美国民权运动研究的典范,其对于美国社会运动理论各家观点的精当评论和对政治过程理论里程碑意义的贡献更使它成为美国社会运动研究者的必读书目之一。

## 二、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脉络

麦克亚当将早期解释社会运动的古典理论总结为“结构紧张/心理失衡(structural strain/disruptive psychological state)”模型。这些理论无

论是使用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社会隔离(social isolation)、原子化的个人(atomized individual)、异化和紧张(alienation and anxiety),或是地位失恒(status inconsistency)等解释话语,都表达了这样一个关系——社会结构紧张导致个体心理失衡,心理失衡导致社会运动。

麦克亚当指出,心理失衡模型中严重的心理取向是与早期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在政治研究中的分工分不开的。政治学家的研究牢牢固守在制度政治(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s)上。社会运动作为一种通过非制度渠道表达的政治抗争,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政治行为,并不在政治学家研究范畴内。而社会学家也甚少关注社会运动和制度政治的关系,而倾向于将社会运动当作一种非理性的、无组织性的心理行为去研究。

麦克亚当注意到心理失衡模型本身的论证是有问题的。首先,他指出已有不少经验研究证明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恰恰是那些整合于社区中的人群,而并非心理失衡模型所针对的被隔离的、原子化的群体。其次,他认为心理失衡模型用收入、教育、职业等客观指标的变化而不是主观数据来解释心理现象的产生是缺乏说服力的。更何况,心理失衡模型在衡量心理状态产生时所使用的样本都是有这些心理状态的人群,而从未与没有这些心理状态的人群做比较。

就理论架构而言,麦克亚当同后来的社会运动研究者(如梯利等人)均认为,古典的心理失衡模型没能解释的关键问题在于——个体心理失衡如何演变为集体行为(Snyder & Tilly, 1972; McAdam, 1999)。麦克亚当评论说,“心理失衡模型在结构紧张和集体抗争间划起一对一的相关关系”,其实“结构紧张至多是社会运动产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McAdam, 1999: 11)。

正由于古典心理失衡模型的这些缺陷,上个世纪70年代资源动员理论得以兴起,并进一步奠定了社会运动作为社会学重要分支领域的地位。资源动员学说认为,社会运动产生的前提是有可利用的资源,而资源掌握在精英手中。社会上存在大规模的心理失衡的个人远远不是产生抗争和运动的充分条件,一盘散沙式的个人有待掌握资源的精英进行动员。

资源动员模型的贡献首先在于不再囿于个体内在的心理失衡状态,而是承认了运动参与者的理性,从而将社会运动“正名为一场政治运动而不是心理运动”(McAdam, 1999: 22)。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引入了一个重要的外生组织变量——精英群体,对组织力量的强调使后来

的社会运动研究者开始关注动员结构(mobilizing structures)和社会运动组织。

然而,资源动员模型对精英群体一边倒的倾向遭到了麦克亚当的强烈批评。他认为,精英群体是制度政治的发言人,强调精英群体在社会运动中的显要作用相当于将研究领域集中在少数能由制度政治渠道表达的改革上,而将这一思想运用在解释社会运动这种非制度的政治行为上无疑是有缺陷的。麦克亚当以民权运动的例子证明,精英在社会运动中的角色并非如资源动员模型所刻画的那样主动积极,恰恰相反,精英对挑战现存政治制度的社会运动一直是相当保守的。

一方面是对精英群体的强调,另一方面是对大众的轻视。麦卡锡和扎德(McCarthy & Zald, 1973)、詹金斯和佩罗(Jenkins & Perrow, 1977)等资源动员模型的支持者将大众视作一无“组织资源”、二无“政治资源”的被剥夺群体,也让麦克亚当感到不满意(McAdam, 1999: 29)。他区分了正面诱因(positive inducement)和负面诱因(negative inducement),认为诱使人们参加政治行动的原因有二:一是能得到正面的回报如金钱和投票权等正面诱因,二是能通过“拒绝提供他人所需要的重要贡献”而对所抗争的他人施加负面影响,也即所谓的“负面诱因”。罢工(strike)、抵制(boycott)等等都是“负面诱因”的例子(McAdam, 1999: 30)。这样说来,被剥夺群体也有可利用的政治杠杆,远非资源动员模型所描述的那样无足轻重。

关于资源动员模型的局限性,麦克亚当直截了当地总结道:“资源动员是这样一种理论:它用于解释特定的集体行为时站得住脚,作为一种解释抗争的综合性理论却不够确切。这个模型应用性的缺陷在于没有区分由被排斥群体和精英群体各自领导的组织变革”(McAdam, 1999: 24)。“资源动员理论只能解释那些由政治精英所发起的有组织的变革”(McAdam, 1999: 34)。

### 三、解读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

笔者认为,尽管麦克亚当将资源动员模型称为有缺陷的模型,但他仍然继承了该模型重视组织要素和动员模式研究的大方向。然而,两者关注的组织力量却截然不同。资源动员模型对缺乏资源的大众的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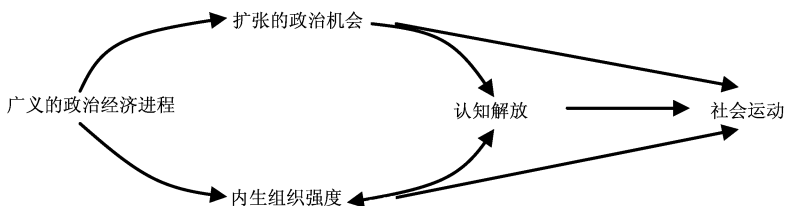
视使其忽略了被剥夺群体的内生组织和网络。而内生组织却是麦克亚当在他的政治过程模型中着力强调的。

此外,资源动员模型对社会不满心理的处理方法是将其作为常量,认为社会中时时存在着不满,因此得出社会不满心理对社会运动的产生并没有显著作用的结论。麦克亚当却指出,结构上的不平等也许是常量,但人群对社会结构的“合法性”(legitimacy)和“可变性”(mutability)的主观看法却是可变的(McAdam, 1999: 35)。他因此认为,资源动员模型将社会不满心理处理为常量使其模型中缺失了重要的一环——“认知解放”。

基于对资源动员模型的批评,麦克亚当将内生组织和集体的认知解放引入到自己的理论框架中,提出了一个更完善的政治过程模型。具体来说,该模型囊括了社会运动的四要素:政治变机(shifting political opportunities)、内生组织强度增长(increasing indigenous organizational strength)、集体特性(collective attribution)和其他组织反应的变化(shifting control responses of other groups)。在解释运动的兴起、发展和衰亡时,麦克亚当认为这四要素相互作用、历时而变。

### (一)社会运动的兴起

如图 1 所示,在解释社会运动的兴起时,麦克亚当主要强调了扩张的政治机会(expanding political opportunities)、内生组织强度(indigenous organizational strength)和认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



资料来源: McAdam, 1999: 51; Figure 3. 1。

图 1 运动产生的政治过程模型

以往解释社会运动的模型都指出了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常简称为 POS)变化给社会运动造成的契机。而麦

克亚当却特别指出, 不应当将政治机会结构变化视作短期剧变, 而应当考察历时的政治机会结构变迁给内生组织、内生网络提供的成长空间和其中的集体意识的酝酿过程。

在这些因素中, 内生组织的作用是本书所着力刻画的重要机制。麦克亚当指出: “一个有利的政治环境只给心理失衡群体抗争的机会。然而却是这些少数群体中的内生资源使它们能够真正抓住这些机会进行抗争……为了产生社会运动, 心理失衡群体必须将有利的政治结构‘转化’为有组织的社会抗争行为。这个转化取决于内生组织的强度” (McAdam, 1999: 43—44)。政治过程模型对资源动员模型最大的发展也正是在于引入内生组织 (indigenous organization), 这使得两个模型在对黑人民权运动的解释上大相径庭。

自上世纪 30 年代起, 随着美国南方棉花经济的衰退和北方的工业化, 大量黑人劳动人口涌入北方城市, 并成为手握神圣一票的选民。资源动员理论家认为, 这些政治变机促使北方政府中的精英着手改善黑人的政治处境, 发动并引导黑人民权运动, 以达到维持社会稳定的目的。而麦克亚当却认为, 黑人社区内部如黑人教会、黑人大学以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NAACP) 等等内生组织才是黑人民权运动的主要组织推动力, 而非前人研究所指出的北方政府精英。

麦克亚当的社会运动研究数据来自于纽约时报的统计 (*The New York Times Index*)。他通过数据分析发现, 政府发动的事件及财政支持常常滞后于黑人运动的显著事件。这个明显的时间差表明政府精英对民权运动的支持是对运动形势做出的审时度势的反应而非主动支持。也就是说, 政府精英一直在扮演保守 (abiding conservatism) 的支持者的角色 (McAdam, 1999: 38)。黑人运动的真正原动力来自植根于黑人社区中的内生组织和网络。然而, 当肯定这些内生组织的作用后, 麦克亚当必须马上回答一个问题, 即内生组织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

麦克亚当认为, 首先, 内生组织的成员和领导者为社会运动的发生提供了人员基础。其次, 内生组织和网络本身就是能提供实质性诱因的结构 (established structures of solidary incentives) ——参与内生网络能得到的人际关系的好处使得人们乐于参加内生网络。当社会运动通过内生组织和网络来招募成员时, “运动参与和组织的成员成为同义词” (McAdam, 1999: 46), 从而使通过内生网络的成员招募变得富有效率。最后, 内生网络为社会运动的迅速扩张提供了传播网络。“社会运动传

播的类型、速度和程度都依赖于内生网络的强度和广度” (McAdam, 1999: 46)。

无论是政治机会结构变迁, 还是内生组织的力量, 说到底还只是运动产生的“结构潜能” (McAdam, 1999: 48)。麦克亚当并没有停留在结构层面上, 而是由此引入了文化主义的视角。虽然他在本书第二版序言中批判自己有些结构决定论, 我们却可以在政治过程模型中看到他寻找文化因素的努力。这一因素便是他总结的“集体特性” (collective attribution)。他认为“在机会和行为间起中介作用的是人们对所处情境所赋予的主观意义” (McAdam, 1999: 48), 黑人社区集体共享的意义, 即他所称的“集体特性”, 在政治变机和集体政治行动间架起了桥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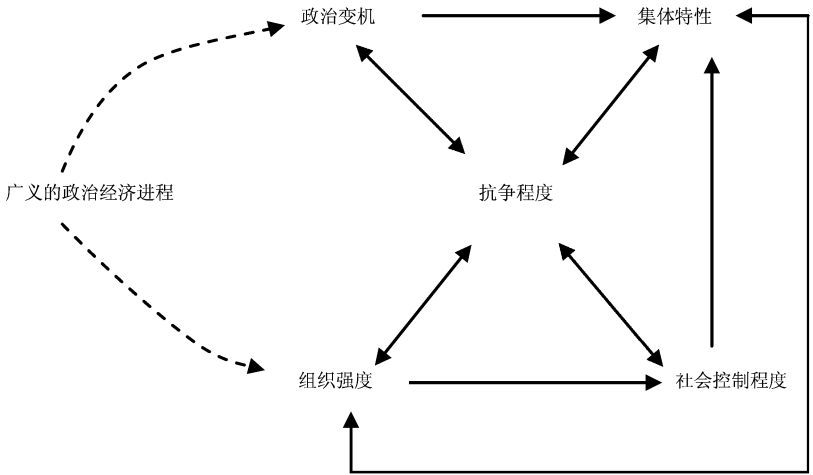
如图 1 所示, 催生集体特性的结构条件有二: 一是扩张的政治机会给人们发出了信号, 使人们意识到社会运动的可能性; 二是黑人社区中已经存在的内生组织和人际网络, 促生了大量同质化的个人 (homogeneous individuals) 和他们之间的联带式互动, 使这些个人拥有共同的价值体系。“在政治变机、组织和行动之间起中介作用的是社区中共共享的文化意义和认知, 包括集体认同感 (collective identity)” (McAdam, 1999)。

麦克亚当进一步提出, 黑人社区对社会运动具有集体特性意义的共识建立在“认知解放 (cognitive liberation)” 的基础上。这个概念是指客观的政治变机只有被人们意识到, 才能使他们挑战现存秩序的行为成为可能。

需注意的是, 此处“认知解放”与古典模型所指出的个体心理状态不同, 前者是一种集体共享的认知状态, 而后者是被隔离的个体对社会结构变化做出的心理状态上的反应。因此“认知解放”这个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将心理失衡模型中个人心理状态和集体政治行为之间漏掉的一环简单补足成“个体心理状态→集体心理状态→集体行为”, 而是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 (二) 社会运动的发展和衰亡

社会运动产生之后如何发展? 麦克亚当引入了“其他政治组织”这个变量, 并在书中无数次地强调社会运动的发展直至衰亡是一个各组织历时互动的过程。这一模型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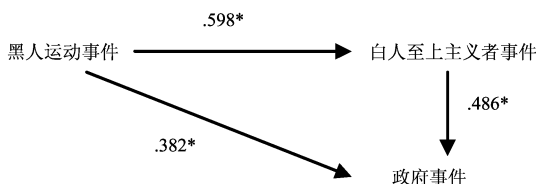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McAdam, 1999: 52; Figure3. 2.

图2 运动发展/衰亡的政治过程模型

由图2可见,在解释社会运动的发展和衰亡时,在原有的政治机会变迁、组织强度、集体特性三要素之外,麦克亚当加入了“社会控制程度”这一变量。具体来说,社会控制指的是包括精英组织在内的其他组织对社会运动发展做出的反应。这也是麦克亚当将社会运动本身的发展程度置于图2中央的原因。他认为,运动的产生(movement emergence)本身就是运动发展的一个自变量,其他组织的反应都是基于对运动本身发展形势的估计。

引入其他组织的作用后,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首先要看精英组织的作用。资源动员模型的预设是:只有掌握资源的精英群体才具有动员能力,并且他们的作用是积极主动的。麦克亚当认为其漏洞在于过于看重精英对社会运动的主导性和推动性,而忽视了精英和运动中其他组织的互动。与此相对照,麦克亚当的研究结果如图3所示,如果将政府行动作为被解释变量,除了黑人运动的直接作用,白人至上主义者(white supremacist)的行为亦是黑人民权运动和政府行为中的一个中介变量(mediating factor),黑人运动所激起的白人种族至上主义者的扑杀也是使政府采取行动的重要原因。政府精英们在民权运动中的真实作用甚至被麦克亚当称为“迎合黑人民权运动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技巧性的中立(tactical neutrality)”(McAdam, 1999: 180)。



资料来源: McAdam, 1999, 176; Figure 7. 6.

图3 运动、白人至上主义者和联邦政府行动间关系的路径模型

随着社会运动的发展,内生组织也并非一成不变。麦克亚当发现,在民权运动肇始时期起到重大作用的黑人教会等内生组织,在后期反而对民权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破坏性作用。随着运动的发展,植根于黑人社区中邻里关系和教会网络的初级组织已经不能应付运动所需,需要建立正式组织来动员,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内生组织寡头化(oligarchization)、被整合(co-optation)或瓦解分裂(dissolution)等问题。随着黑人运动的发展,斗争议题逐渐多元化,内生组织也产生了分化,如政府精英和公众等外在群体难以再建立起一个对黑人民权运动的统一看法,从而削弱了外部支持的力度。

#### 四、政治过程模型的方法论意义

麦克亚当的政治过程模型引入了内生组织、组织间互动、集体意识等以往解释社会运动的模型所轻视的因素,更贴切地展示了复杂纠结、因时而变的政治过程。该书也因此具有方法论上的重大意义。

正如麦克亚当所指出的,心理失衡模型和资源动员模型对社会运动产生的阐释都是一个短期的“刺激—反应”模式(McAdam, 1999, 60)。个体或是受了社会结构变迁的刺激而产生心理失衡,从而进行积极抗争;或是仿佛手握资源的精英一动员,就会转身走上街头。这一模式在历史截面中寻找社会学研究所重视的因果关系,忽略了历史内在的演变逻辑。

反观麦克亚当,为了清楚地揭示美国黑人运动政治过程中的各种机制是如何在历史中发生作用的,他甚至将其研究数据的起点追溯到了1876年。麦克亚当认为从1876年北方共和党人为争取选举支持在



黑人问题上向南方妥协并撤走联邦军队,到1954年高等法院裁决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s. Topeka Board of Education)结束学校的种族隔离,都是抗争者构建其对运动成功可能性的预期的形成过程和黑人运动组织的酝酿过程。

这种态度甚至是历史学的。在本书第二版序言中,麦克亚当坦承本书的两大写作目的之一就是“现代民权运动是美国历史的分水岭,我想尽力弄明白它的历史根源”。这一研究态度让人不得不起普特南对意大利公民传统的研究(Putnam, 1993)。普特南和他的助手从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设立15个地区政府(regional government)时开始追踪研究,试图解释意大利南方和北方在公民传统(civicness)上的重大差异,结论是这个差异得溯源到公元1100年北方德意志帝国式的初级的公民传统和南方拜占庭帝国式的非公民传统之间的差距!

除了强调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是一个各组织历时互动的过程,本书更大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将社会运动与广义的制度政治联系起来,从而与主流政治学研究进行了对话。

麦克亚当指出,对美国民主政体的看法大致可分为两种:多元政治(pluralist political power)和精英政治(elite political power)。诚如麦克亚当所指出的那样,“社会运动理论背后总有一个更广义的制度政治模型”(McAdam, 1999: 36)。他富有洞察力地指出,早期解释社会运动的心理失衡模型正是将美国民主体制视为多元政治的产物。多元政治认为民主政体下政治权力由大众分享,每个群体都有能力通过制度化的手段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不诉诸制度化途径表达的政治行为如社会运动等,就理所当然地被视为非理性行为,应从心理角度去解释。

与之相比较,资源动员模型背后却是将美国民主政体视为精英政治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资源和权力集中在精英群体的手上,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动员社会运动,推动社会变革。

麦克亚当自认为其政治过程模型背后关于制度政治的预设既非完全的多元政治也非完全的精英政治,但他更倾向于认为美国政体是精英政治,精英和被剥夺群体间的差距是社会冲突的起因。他宣称自己的根本立足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即相信社会结构也给置于其中的被排斥群体“结构的力量(structural power)”(McAdam, 1999: 37)。在他看来,社会运动是“被排斥群体动员足够的政治势力通过非制度化途径追求集体利益的理性行为”(McAdam, 1999: 37)。

当然本书的读者很容易辨别，麦克亚当显然并不相信被剥夺者的抗争像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所描绘的那样不可避免、历史所趋，也不像资源理论模型所描述的那样仅仅依赖于精英动员，如前文所述，他认为内生组织、组织间互动、集体特性都是不可忽略的动因。

麦克亚当呼吁对社会运动背后的制度政治进行本体论意义的研究，为社会运动研究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至今这一领域仍有待发展，并且这种研究方法对中国社会运动研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虽然本书论证详实，提出的理论模型也自成逻辑，但笔者认为麦克亚当并未完成他本人所设置的所有理论目标。

首先，他对心理失衡模型的批评没能解释个人心理失衡如何转化为集体行为，其实本书提出的政治过程模型也没能完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尽管麦克亚当提出的认知解放确实是社会运动发生的前提，但其研究的着眼点仍旧是结构要素，包括政治结构变迁、内生组织如何促进了认知解放。按照这一逻辑推演，个体只要在结构上接近组织要素，就会形成基于这些组织要素的集体行为，如住在黑人社区、参加黑人教会和身在黑人大学就会参与抗争。这个机制中缺失的环节仍是社会心理意义上的解释。

麦克亚当本人后来也注意到这一点，作为一个严谨求实的学者，他在时隔17年后的第二版序言中直言不讳地承认，尽管政治过程模型注意到了文化要素，但后来在模型的表达中，原先的“结构/建构话语 (structural/constructionist account)”还是变成了“结构决定论 (structurally determinist)” (McAdam, 1999: xi)。他借鉴文化主义的研究指出，“内生组织或网络要成为动员和招募 (mobilization and recruitment) 的前提是足够的运动参与者在文化上建构它们并把这个意义赋予它们” (McAdam, 1999: xiii)。他也谈到要借鉴理性主义的研究，似乎意指将理性个人对政治机会结构的计算考虑进来，但却语焉不详。

此外，“认知解放”这个概念本身也没有严密的定义。在本书关于“认知解放”的一小节中，麦克亚当并没有提供独立成句的定义。根据上下文，他指的是“政治结构中(对社会运动)有利的变化是否被一个足够大的群体定义为有利的” (McAdam, 1999: 48)。他将“认知解放”视为过程 (process) 而非状态。这个集体定义和解读政治机会的过程被麦克亚当刻画为抗争群体和外部群体间的符号互动。具体来说，当有利于某群体的政治机会发生，其他群体就会相应地做出更强的符号反应

(symbolic responsiveness)。而这个增强的符号被抗争群体接收后,又会增强他们对既存社会结构可挑战性的估计。内生组织和网络会为此符号互动过程提供交流网络,从而放大和传播信号(McAdam, 1999: 51)。

比起“认知解放”在政治过程模型中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本书关于“认知解放”的论述显得有些薄弱。首先,虽然麦克亚当使用了“认知”的字样,其表达的“对社会结构可挑战性的估计”(McAdam, 1999: 49)却是理性的,依赖于对外部群体发出的信号的评估。麦克亚当似乎将符号互动视作一个真空的过程,信号的强度是可以理性估计的,信号在传播过程中亦不会被扭曲,而忽略了权力关系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尽管麦克亚当没有明文使用“符号互动论”的字样,关于符号互动论的研究却表明,宏观制度和结构是通过微观的符号互动过程来执行的,不能忽视宏观结构在微观互动中的表达(Stryker & Vryan, 2003)。掌握权力的政府精英完全可以通过控制教育、媒体等媒介影响被排斥群体对符号的解读。

其次,外部群体做出的符号反应如果由新制度学派(neo-institutionalism)的学者来解释,大有可能被理解为是一种为体现合法性而做出的形式上的遵从(Meyer & Rowan, 1977),而非体现真正的政治机会变迁。具体来说,政府对黑人运动的兴起做出关心的姿态就真的意味着既存社会秩序松动了吗?

第三,虽然麦克亚当解读社会运动发展时注意到了各个群体的互动,在促成认知解放的符号互动过程中却并没强调这一点。其实符号互动并非仅仅发生在抗争群体和外在于群体之间,也发生在各个外在于群体相互之间。举例来说,麦克亚当认为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结束学校的种族隔离,是民权运动发展中的重大事件。这个事件发出了政府精英关注黑人诉求的可能性增强的信号,从而使运动参与者对运动前景变得乐观,促进了认知解放。而事实上,稍知美国民权运动历史的人就知道,该案的裁决激起了强烈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反击,白人公民委员会(White Citizen Council)就成立于这一年,并随后取得迅猛发展。这时两个外部群体(政府和白人至上主义者)之间也发生了符号互动,此时抗争群体该怎样定义政治机会的好和坏呢?“对社会结构可挑战性的估计”又建立在谁的符号反应上呢?

尽管有这些缺点,这本书依然堪称立论清晰,逻辑缜密,为政治过程模型成为社会运动研究领域的重要流派奠定了基础。麦克亚当的这

部著作建基于他的博士论文,他于上世纪70年代在大学学习社会学,那正是美国对民权运动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年代。对这段历史本身的热情使他努力寻找一个更贴近于历史真相的模型,强调历时研究的意义,并指出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是一幅心理失衡模型和资源动员模型远远未曾描绘的复杂图景,多个组织在其中互动,多重因素都有其历史成因却又因时而变。这种研究态度也使他的社会学研究得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结论。

#### 参考文献:

- McAdams, Doug 1999,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 — 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econd Edition.
- McCarthy John D. & Mayer N. Zald 1973, *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Morristown, N. J.: General Learning Press.
- Meyer, John W. & Brian Rowan 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 Jenkins Joseph Craig & Charles Perrow 1977, "Insurgency of the Powerless: Farm Worker Movements (1946—1972)."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
- Putnam, Robert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nyder, David & Charles Tilly 1972, "Hardship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France, 1830—186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
- Stryker, Sheldon & Kevin D. Vryan 2003, *The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Frame*. In John DeLamater (ed.),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NY: Kluwer/Plenum.

作者单位: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杨 可